

乾隆朝继续进行了康熙、雍正两朝的国家统一战争，并取得了对西北用兵的胜利，从而继汉、唐、元诸王朝后再度实现了对西域新疆的统一。清朝纳西域新疆入王朝版图后，中国的疆域也臻于极盛，乾隆帝表达了“关门以西，万有余里，悉入版图”的自豪感。这一时期的国家修史也纷纷把书写西域新疆作为共同的时代主题，用来昭示国家的疆域“大一统”之盛。《皇輿西域图志》一书即是在清朝统一西域新疆后，第一部由官方主导编纂的新疆史地书籍，系统记载了西域新疆的丰富多元面相，蕴含着较为鲜明的疆域“大一统”意识。

疆域信息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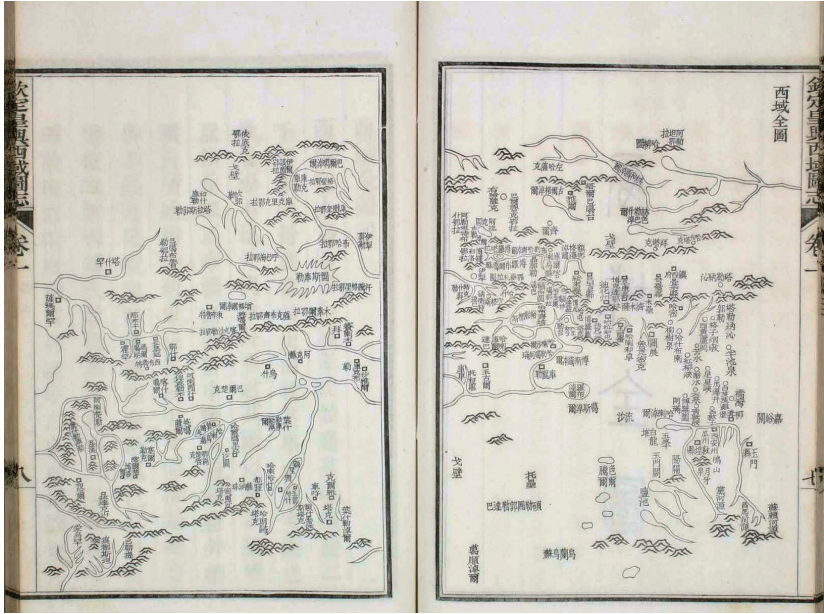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清朝统一西域新疆的过程中，就认识到该地域极具辽阔性，需要掌握充足的疆域信息才能便于施政。然而，在中国历史上，由于西域地区与中土往往是“通绝不常”，就连负责知识记录的史官也多多是“未尝亲履其地，惟借传闻”，最终成书的文献多有缺略和讹错，史料真实性也无从研判，“自西汉以来，两千余年之沿革……征信无由”。这显然并不能满足清王朝对于疆域信息的渴求，因此，编纂一部准确记载西域新疆的史书可谓势在必行。

清朝在最初编纂《皇輿西域图志》之时，也是想通过获取新知识来校正以往史书记载的错误，“补前朝輿记之遗，而正历代史书之误”。为此，清政府要求，该书的编纂一定要坚持“考古验今”原则，“验今”应是凭“自身所经历”而得，而绝非是简单的“沿袭故纸者”。清朝秉持的这种严谨“求真”态度固然是中国史学的根本遵循，然而，也蕴含着极为浓烈的政治诉求，那就是解决清王朝对于疆域信息未知所引发的担忧。

就《皇輿西域图志》一书的编纂过程来看，先后经历了“初稿”和“定本”两个阶段，共历时26年方完成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正月，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，乾隆帝就遣三等侍卫卫三、左都御史何国宗等人“挈带仪器，前往伊犁测量暑度”，这也为《皇輿西域图志》的编纂做出了准备。二月，乾隆帝下谕旨让刘统勋等人开始编纂《皇輿西域图志》，至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六月，该书的编

疆域“大一统”与《皇輿西域图志》的编纂

□ 李金飞



的全貌，是了解西域新疆史实的首选文献。全书按照门类谋篇布局，门类之下，又按照地域划分成“四路”：安西南路、安西北路、天山北路、天山南路。文本信息也多以各路所含具体地点再展开叙述。

“天章”一门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乾隆帝关于西域新疆的御制诗和御制文，“统论西事全局者，敬谨汇录”。当然，这是当时整个国家修史遵循的固有“范式”，以突出乾隆帝在统一西域新疆中的“武功”伟业以及扮演的主导角色。“疆域”一门设墨最多，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方式就是使用“地图”来直观描述疆域，再配以“图说”进行解释，“山川方位，远近形势，匪图弗显。图举其形，志详其事”。新绘制地图多达21幅，再附上以往历代的12幅，共33幅，以着力向世人展现出西域新疆的完整面貌。

“列表”一门的叙事主要是为了明确国土的分合和建置的沿革。“分野”是中国传统王朝用来书写

疆域合法性的主要方式，也就是把疆域拥有归为上天所赐，“列宿之在天中，犹九州之在地中也”。在“初稿”本中，清朝显然延用了这种惯用的方式来书写疆域。然而，这并不能够展现出疆域的实体性与完整性，从而也让“分野”备受诟病，“分野之说，空虚揣测，依据为难”。作为现代书写方式的“暑度”却使用北极高度，距京师偏西度，夏至昼长和夜长，冬至昼长和夜长，午正日景夏至长、冬至长、春秋分长等元素，其对地理位置描述的准确性绝非“分野”所能堪比。因此，最终成书的“四库本”专门使用“暑度”取代“分野”来书写西域新疆。

在“山”“水”两门中，除按照安西南路、安西北路、天山北路、天山南路介绍外，还专门描写了“天山正干”。“钱法”一门包含制式、炉局、名数、行使四项。“学校”一门则按照“安西州属”“镇西府属”“迪化州属”三部分介绍清朝在边疆设立学校、推行儒

家文化的情况，代表着清朝实现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实践。

“风俗”“服物”“土产”三门主要对“准噶尔部”和“回部”进行介绍。如准噶尔风俗有事佛、畜牧、相见、刑罚、岁时、嫁娶、丧祭；回部风俗有拜天、田畜、相见、政刑、岁时、嫁娶、丧祭。准噶尔部和回部的“服物”均包括被服之具、坐卧之具、饮食之具、日用之具、攻战之具、成物之具。准噶尔部和回部的“土产”均包括百谷草木之属、羽毛鳞介之属、金石珍宝之属。

《杂录》中分“准噶尔部”“回部”，记载了“世系”“字书”“语言”“故事”。如准噶尔字书“名托忒，共十五字头，每一字头凡七字”，回部“其书特异，共二十九字头”。清朝“崇儒重道”，倡导融合多元文化为一体，即中华文化。与此同时，又极为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。“杂录”里充分展示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，实际上就是清朝对于多元民族文化的认可和肯定。

“大一统”格局的历史书写

《皇輿西域图志》专门为记载西域新疆而纂，是盛清“大一统”格局的历史书写，蕴含着极为强烈的“大一统”意识。可以说，昭疆域“大一统”之盛成为其中最为鲜明的宗旨。

“西域全地，悉归版图”，这是乾隆朝国家“大一统”的重要标志。《皇輿西域图志》就是欲通过记载清朝的“拓宇之功”彰显出“大一统”之盛。因此，在整个文本建构与历史书写中无不洋溢着“昭中外一统之盛”的理念。如《国朝官史》针对“初稿本”的编

纂目的，就记载如下：“乾隆二十四年，平定西域天山迤北，西海之滨咸隶版图，皇上特命纂西域图志。”

在《皇輿西域图志》的开篇特设“皇輿全图”，来呈现清朝纳西域新疆于版图后的整个国家疆域面貌。“皇輿全图说”明确把西域新疆作为清朝“大一统”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：“中华当大地之东北，西域则中华之西北，为大地直北境也。自嘉峪关西，迄准部回部外，列藩部，圆广二万余里，其疆圉之阔，远几与中土。”质言之，该时期的疆域之“广”，成为“大一统”的一个显著特征。

《皇輿西域图志》在展示清朝疆域“大一统”之时，采用了与以往历代对比的方法，表达出“远超前代”的疆域赛跑思想。在该书看来，以往的“大一统”功业仅是“宰制宇内”，而清朝统一西域新疆后，“中土之与西域始合为一家”，这也是为何该书对于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赞美始终不遗余力，“此固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为君而不能得于中天之世者也”。

当然，《皇輿西域图志》在昭示疆域“大一统”之时，还尤为注重对疆域统一合法性的书写。在书写疆域时，该书先是介绍此地的历史沿革，以及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，是为表明此地并非“化外之域”，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在叙述完以往历代后，该书又以“本朝”作为开始，这表明清朝很自觉地以中国历代王朝的继承者自居，这实际上表达出极为强烈的疆域继承意识。

总之，作为清朝官修的第一部新疆史志书，《皇輿西域图志》倾注了清王朝的诸多心血，这既呈现出西域新疆的丰富面貌，也是在清朝完成统一后的疆域书写确认，展示出盛清时期中华民族的疆域版图面貌，这是国家“大一统”最为真实的见证。《皇輿西域图志》也是当代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根据。

历史文化

典籍



『道虽迩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』

□ 赵威

“道虽迩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”出自《荀子·修身》，意思是说路途虽近，不走永远不会抵达终点；事情虽小，不去做永远不会完成。这句话可以看作“修身”篇的主旨，强调笃行实干的重要性，提倡身体力行、知行合一。在说明“行”“为”的重要性后，荀子分析了修身的三重境界：把礼法贯彻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中，这是士人；具有坚定意志并能亲身实践、孜孜不倦，这是君子；敏捷明智并坚持不懈践行真理，这是圣人。修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无论士人、君子，还是圣人，都需要永不停歇地努力实践，这一思想也见于《荀子》其他篇章，譬如《劝学》中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”，《儒效》中“知之不若行之，学至于行之而止矣”等。这些都是对儒家尚行、重行思想的充分表达。

注重实干精神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。《尚书·说命》认为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”，《中庸》提出“力行近乎仁”，一个人做得如何，是不是踏实地行动，直接体现他的素养。北宋政治家赵普有句名言：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儒家思想是用来治世的实践理论。明代王守仁明确提出“知行合一”的命题，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。不只是儒家，老子也说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”，行动起来，坚持不懈，才是人生正途。《韩非子》认为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，基层

实践是大熔炉，文臣武将要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。可见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，注重“知”与“行”的不可割裂，并且将最终落脚点放在了“行”上，蕴藏着学以致用、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智慧。

“长安何处在，只在马蹄下。”只要有决心、有行动，马蹄不停奔走，就能抵达人生梦想的彼岸“长安”。古往今来，那些胸怀鸿鹄之志、成就壮丽事业，一心为国为民谋福祉的志士仁人，无一不是行动派、实干家，无一不是只争朝夕的实干、久久为功的力行。

明万历年间，兵部侍郎曾汪道昆被派往蓟辽巡视防务。汪道昆来到边关后，不听汇报不搞巡视，却和当地文人一起吟诗作赋。回到京城后，他字斟句酌、玩弄词藻，写了一份行文优美的散文奏章。张居正看了后，愤然写下“芝兰当道，不得不除”，罢免了其官职。一个兵部的官员不想着打仗的事，却整日沉湎于笔墨粉饰，就像兰花杂草，即便再名贵、长得再好，长错了地方，就要被铲掉。其实，张居正害怕纸上谈兵的故事在自己手里重演。崇尚实干的张居正在大刀阔斧进行变法之时，就特别注重提高行政效率，推出考成法，把各个官员要完成的年度考核要求编订成册，正本交六科考核，副本留在内阁备查，年底依册考核，完成一件事就勾除一件事，达不到考核要求的免职贬官。《明史》记载，考成法实施后，官场风貌为之一变，官僚机构的效率高到早晨朝廷颁布的诏命，傍晚就能得到良好的执行。张居正执政时，明朝国富兵强，财政出现了少有的连年盈余。

可是，翻阅史书，当道“芝兰”又何其多？魏晋间一些士大夫

不务实际，空谈哲理，称作“清谈”。名士王衍就是这样一个人，《世说新语》称他“处众人中，似珠玉在瓦石间”。他少壮登朝，累迁至司徒，位高权重，却带领朝廷中坚谈玄论道，避实就虚。永嘉之乱，作为统帅的王衍被胡人石勒俘获。十分仰慕名士的石勒把王衍奉为上宾，想听听他对西晋亡国的思考，以作借鉴。没想到王衍不仅以清谈之姿极力为自己辩护，撇清亡国和自己没关系，还为了讨好石勒，恬不知耻地劝石勒称帝。看到“名士”这副嘴脸，石勒呵斥道：“你身居要职，从年轻时就受到重用，到现在已经白头，如何说不参与朝政？晋朝亡国，正是用了你这样的人！”清谈误国，说到底还是空话、套话误国。前车之鉴，发人深省。

每一项事业，不论大小，都是靠脚踏实地、一点一滴干出来的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这是永恒的道理。决不能雷声大雨点小，也不能因为事情小就不动手去做，而是要力戒空谈、积极行动。苏轼一生生活在竞争的夹缝中，三起三落，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即便被一贬再贬，他都不改初心，总是不忘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点事情，而且注重实践的有效性。被贬到岭南小城惠州，早已做了“白首不归”打算的苏轼，并没有躺平，也没有独善其身，依然把救助民间疾苦作为头等大事。惠州城西的丰湖上有座木质长桥，屡遭毁坏，有人建议用“坚若铁石”连“白蚁不敢蛀”的石盐木重修。为了修缮这座桥，苏轼积极参与，还把自己的一条犀带捐作建桥基金。桥修好后，他写诗描述了百姓的激动之情：“父老喜云集，箴壶无空携。三日饮不散，杀尽西村鸡。”他又告诫：“常当修未坏，勿使后囷圯。”另外，苏轼见惠州营

房缺乏，军人散居城乡，对百姓造成困扰，于是建议修建营房上百，解决了军人的居住问题。苏轼对待每一个到达的地方，都认作是“归乡”，都当作施展抱负的舞台。因为他心中装着对黎民百姓的责任感，这份责任感不但没有因朝廷的疏远贬谪而消融，反而把这份责任外化于行。

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。新时代呼唤新作为，面对改革发展的难点、痛点、堵点，我们决不能当“鸵鸟”，必须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、敢于动真碰硬。在实践中，注重量的积累，从小事做起，夯实基础、日有所进，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实干苦干，就一定能作出自己的贡献，成就一番事业。